

海外華人與近代中國： 1905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

黃賢強**

摘 要

過去研究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的中外學者，都偏重論述該運動在中國境內的發展和特點，而忽略海外華人與這個運動的密切關係。本文首先要探討的是，為何海外華人會參與這個最先由上海商人所發起的抵制美貨運動；其次，比較美國華人、英屬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以及澳洲華人抵制美貨或抗美運動的不同動機，不同的參與者身分，以及不同的抵制或抗爭模式；其三，論證抗美運動與反滿革命運動的因果關係。

本文一方面證明近代中國的政治社會運動，與海外華人存在著相互影響的關係；另一方面也論證海外地區的抵制活動，與中國境內的抵制運動在很多方面有不同之處。而且，不同地區的海外華人也會因居留地的不同處境和利益，而對抗美運動有不同的表達形式和抗爭力度。本文以海外華人的史料和視角，重新探討1905年的抗美運動，不只對這個社會政治運動提出新的定位，並凸顯出在追求客觀論析涉及海外華人的近代史事時，應多關注海外華人的想法和處境，及使用其史料的重要性。

關鍵詞：海外華人、近代中國、抵制美貨、抗爭運動

* 本文初稿於2003年3月6日發表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術討論會上。作者要感謝討論會評論人張存武教授的評語，也感謝陳永發、沈松橋、朱浚源、張瑞德、許文堂、潘光哲、陳延煖等先生的意見。作者更要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和建議。當然，文章的論點和瑕疵，由作者自負。

收稿日期：2003年12月29日，通過刊登日期：2004年5月5日。

** 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兼副主任

一、前言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是近代中國政治和社會變遷過程中所發生的一場群眾運動。從政治層面而言，它是由義和團的暴力排外運動過渡到文明的抵制外貨運動。從社會層面而言，它不再像太平天國運動般，由下層社會人民為主導的反抗運動，或是像戊戌變法般由上層知識分子所策劃的改革運動，而是由不同社會階層人民共同參與的抗爭行動。

但至今海峽兩岸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專家並沒有給予這個運動足夠的重視。例如，《近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和《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都沒有論及這個史事的研究狀況。¹當然，這個群眾運動並沒有完全被人忽略。在中國大陸方面，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出版了不少相關的史料彙輯。²1980 年以來的論文主要討論抵制美貨運動的人物和資產階級的角色，以及議論抵制美貨運動的起因和性質。³在台灣方面，除了 1960 年代中期張存武出版的一本專書外，不見有其他學者對此運動作進一步的深入研究。⁴日本方面，也有一些學者注意到這個運動，但主要是將這個事件放在民族主義運動

¹ 曾業英等編，《近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² 主要的編彙成果，包括朱士嘉，《美國迫害華工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丁又，〈1905 年廣東反美運動〉，《近代史資料》，1958 年第 5 期，頁 8-52；〈1905 年廣東人民反美運動大事記〉，《廣東歷史資料》，1959 年第 2 期，頁 44-62；中科院廣州哲科所和中山圖書館編，《1905 年廣東反美愛國運動資料彙輯》（廣州，1960 年油印本）；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這時期也出現一些通俗的故事書，意在宣傳反美情緒，其中包括：不著撰者，《1905 年上海人民的反美愛國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周美綺，《1905 年的反美愛國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62）。

³ 其中包括郝貴遠，〈柔克義與抵制美貨運動〉，《歷史檔案》，卷 26 期 2（1987），頁 95-100；郝貴遠，〈梁誠與抵制美貨運動〉，《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頁 47-60；沈雨梧，〈1905 年反美愛國運動與浙江資產階級〉，《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82 年第 3 期；金希教（韓籍學者），〈抵制美貨運動時期中國民眾的「近代性」〉，《歷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頁 92-107；王冠華，〈愛國運動中的「合理」私利：1905 年抵貨運動夭折的原因〉，《歷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頁 5-21；王立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抵制美貨運動〉，《歷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21-33。

⁴ 張存武，《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的框架上來討論，並將它列入中國歷次「杯葛」(boycott)運動的其中一環。⁵美國方面，從 1930 年代以來，陸續有一些文章和專書中的章節討論這個事件，但大部份是將它放置在中美商貿關係和中美外交關係的架構上來分析，⁶或者將它與中國的反洋教排外事件並列討論。⁷

過去的這些中外論著都有一個共同點，即是偏重論述抵制美貨運動在中國境內的發展和特點，而忽略海外華人與這個運動的關係。⁸即使是本人過去出版的英文拙著，重點也是擺在抵制運動在中國上海和廣州等地的發展，並將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作為近代中國文明抗爭運動起源點的理論框架上來論析。⁹拙著中雖然有一章討論海外華人與抵制運動的關係，但只是分別概略地敘述美國華人催生抵制美貨運動的角色，以及新馬華人積極響應的情形。在同一章中，也提到抵制運動與反滿革命運動有密切關係，但沒有深入辯證兩場運

⁵ 菊池貴晴，《中国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対外ボイコットの研究》（東京：大安出版社，1966）。

⁶ Charles 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Delber L. McKee, *Chinese Exclusion versus the Open Door Policy, 1900-1906: Clashes over China Policy in the Roosevelt Era* (Detroit, Michiga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⁷ Edward J. M. Rhoads,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Kwangtung, 1905-1906: The Canton Anti-American Boycott and the Lienchow Anti-Missionary Uprising," *Papers on China*, no. 16 (1962), pp. 154-197.

⁸ 王冠華的英文專著：Guanhua Wang, *In Search of Justice: The 1905-06 Chinese Anti-American Boycot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主要是討論上海抵制美貨運動的性質。一些通史類的美國華僑史書，也有一些章節論及抵制美貨運動，但只是概括性的介紹，缺乏深入討論，也沒有引用海外華人史料。例如，楊國標等著，《美國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第十章。論文方面主要有吳金平，〈美國華僑與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35-41；Delber L. McKee, "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6 Reconsidered: The Role of Chinese American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5:2 (1986), pp. 165-191。但兩者都是以二手史料為主，輔以一些美國的官方資料。至今比較充分使用海外華人史料，來討論抵制美貨運動者為黃賢強，《海外華人的抗爭：對美抵制運動史實與史料》（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1）。但拙作重點是史料的介紹，和各地海外華人參與抵制活動的概況，並沒有像本文對各地海外華人參與的動機和特點作比較的研究和論析；當然也沒有論及海外華人與中國近代政治和社會變遷的互動關係。

⁹ Wong Sin Kiong, *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這本拙作是作者的博士論文"The Genesis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of the Anti-American Boycott of 1905-06," (Ph. 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5)改寫而成。該文特別從抵制運動的動員方法和宣傳模式，來辯證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為近代中國文明排外運動的起源點。

動之間的因果關係。

本文即是在筆者過去的研究基礎上，將研究視角擴大和研究論點深化，以海外華人的史料和觀點出發，深入比較美國華人、英屬新加坡和馬來亞華人，以及澳洲華人抵制美貨或抗美運動的不同動機，不同的參與者身分，以及不同的抵制或抗爭模式。在研究脈絡上，本文一方面嘗試突破中國政治社會運動與海外華人社會分開或平行論述的模式，而採用探討兩者之間的交叉影響和互動關係。另一方面也要破除將海外華人當作一個整體來看待，以比較研究的方法，論證各地海外華人對於一些與中國有關的政治社會運動，會因不同的地域和政治社會處境，而有不同的自身考量和反應模式，進而對抵制運動和革命運動的因果關係，也會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二、美國華人與近代中國：抵制美貨運動的形成

中國人傳統上不習慣遷徙，除非是天災人禍等因素所逼。十九世紀中葉，大量中國人遠渡重洋，基本上也是因為中國發生內憂外患，使得人民生活困苦，才思出洋謀生之路。所謂的內憂，是指太平天國運動殃及中國南方各省，長達十四年(1850-1864)之久。而外患則指自鴉片戰爭(1839-1842)以來西方各國對中國的蹂躪，使中國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再加上風災、水災、旱災和蝗災等天然災害，以及人口的增長等自然因素下，造成人口移動規律中「推力」的形成。而在同一個時期，世界上有幾個地區，剛好有「拉力」的磁場，吸引貧困的中國人前往謀生。其中包括西方國家在東南亞各地的殖民地，正在招募大量勞工前往開拓經濟資源；美國加州和澳洲等地先後於 1840 年代末和 1850 年代初發現金礦；美國於 1860 年代需要大量勞工修築東西橫貫鐵路等。一股海外移民浪潮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形成，而海外華人社會也先後在東南亞、美國和澳洲等地華人聚居的地方相應形成。這是中國對海外華人社會的第一個影響，也可以說是清末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變化，孕育了海外華人社會。

早期美國華人以華工為主，這批經濟移民與祖國的政治關係是非常淡薄

的，他們關心的只是家鄉親人的溫飽和平安。海外華人和中國之間的聯繫，主要建立在匯款回鄉和書信往來的基本面上。清朝政府對這些移民，最初是能力上無法照顧，在觀念上也不屑一顧。後來在西方的壓力下，才處理一些與海外華人有關的事務，包括 1860 年分別與英國和法國簽訂的「北京條約」，同意兩國在中國招工，以及在 1870 年代後期開始委派駐外公使或領事，處理外交和華僑事務。¹⁰滿清政府遲至 1893 年才正式廢除海外華人回國的禁令。

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美國華人基本上是處於一種「自求多福」的處境。面對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排華禁例和白人的歧視，也多以「百忍成金」的心態度過。滿清駐外公使或領事，名為有護僑之責，但由於個人能力的侷限，¹¹以及國家衰落的現實，並沒有對華僑的生命財產有保護的作用。海外華人的安危，主要是靠當地的華人會館和秘密會社的勢力。這是中國對海外華人的第二個影響，也可以說是由於清末國力的衰弱，造成海外華人不能依靠外交手段來保障他們的安全，而必須依靠華人社會本身的力量，間接造成白人攻擊華人的一個口實，即以公司（會館）和秘密社會的力量，在唐人街內行使非法的控制和司法權。

美國的排華運動始於 1870 年代初，那是由於開採金礦的高峰期已過，再加上中央太平洋鐵路也於 1869 年完工，數萬名礦工和築路華工轉向其他行業謀生，嚴重影響到以歐洲移民為主的美國白人的工作機會。同一個時期，美國正面臨經濟不景氣，使失業的美國白人大增，華工因而成爲代罪的羔羊和被攻擊的對象。1870 年代末期，美國勞工組織工人黨，促使政府制定排華政策，並影響美國兩大政黨（共和黨和民主黨）一致支持排華法案。1882 年，美國國會通過第一個排華法案，主要條文包括禁止華工進入美國，爲期十年。1888 年，國會再通過另一法案，規定華工出境後，不准重新進入美國。1892 年及

¹⁰ 滿清政府於 1875 年任命陳蘭彬爲駐美國首任公使，陳於 1878 年才抵達華府就任。1880 年，清廷開始在三藩市設有總領事。

¹¹ 以滿清駐美國公使爲例，在伍廷芳公使（任期 1897-1902）之前的首五任公使都不懂英文，因此不可能與美方進行有效的交涉。

1902年，國會延長1882年法案各十年，而且變本加厲，增添更多限制。1904年，美國更進一步規定，排華法案從此無限期延長，並且適用於不久前納入美國版圖的夏威夷及菲律賓群島。¹²

美國排華法案雖然成功地限制華工入境，使居美華人人數自1882年的十萬多人逐漸降低，但種族極端分子並沒有因此停止活動，反而繼續鼓動群眾滋擾華僑。規模較大的暴行，包括1885年在懷俄明特區石泉城(Rock Spring, Wyoming Territory)的屠殺華工事件。在這次事件中，共有28名華人遭殺害，15名受傷，財產損失高達十幾萬美元。¹³兩年後，在奧利岡州(Oregon)的蛇河(Snake River)附近，一群白人暴徒殺害華籍礦工10人。¹⁴

除了大規模的屠殺華工慘案外，也常發生華人受到苛待的事件。不管是準備進入美國的華人或已定居的華僑，都可能是受害者。根據清廷駐美公使楊儒和美國國務卿格撒姆(Walter Q. Gresham)於1894年簽訂的中美條約，屬於非勞工階級的華人，包括官員、商人、教師、學生及旅客，都可以依規定手續入境。¹⁵但美國移民局海關人員往往刁難這些華人，並曲解「勞工」兩字的定義。除了商店東主外，所有的行政和管理人員，包括經理人員、簿計員、收銀員等，一概被列入勞工階級，而遭拒絕批准入境。其實，不只是正準備入境的華人受到苛待，連久居美國的華僑也常遭到騷擾。1903年10月11日夜晚，美國東部大城波士頓(Boston)的員警及移民局人員，大舉臨檢唐人街地區，並逮捕可疑的或沒有隨身帶身分證的華人，在被拘禁的244人中，有45人隨後被驅逐

¹² 沈已堯，《海外排華百年史》（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0），頁33-35。

¹³ 黃和英，〈百年前美國石泉城屠殺華工事件〉，《傳記文學》，卷45期3(1984)，頁65-72；Shih-shan Henry Tsai,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Fayetteville, Ark: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83), pp. 72-73; Tzu-kuei Yen, "Rock Springs Incident," in Arif Dirlik, ed., *Chines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p. 355-366.

¹⁴ Shih-shan Henry Tsai,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pp. 86-89; David H. Stratton, "The Snake River Massacre of Chinese Miners, 1887," in Arif Dirlik, ed., *Chines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pp. 215-230.

¹⁵ 有關條約英文版內容，請參考 Charles I. Bevans, comp.,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76-1949*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vol. 6, pp. 691-694.

出境。¹⁶這事件提醒在美華人，排華運動不僅限於華工集居的加州及其他西部各州，連東部地區也不能倖免。

旅美華人自 1900 年開始，對美國的排華行為作出強烈的抗議。一份於三藩市具影響力的中文報章《中西日報》，在 1900 年 3 月至 11 月間陸續刊載文章，鼓吹反制排華行動。¹⁷《中西日報》建議中國減少與美國的貿易，直到限制中國移民的政策獲得改善為止。1901 年，美國華人社會請《中西日報》的主管伍盤照巡迴訪問各地，向美國白人和華人聽眾解釋修正排外法案的必要性。¹⁸由於報章和報人的努力宣導，1903 年中，美國華人已經達成共識，決定全力阻止將在次年屆滿的中美排華條約的續約。1903 年 10 月，美國三藩市中華會館正式請求滿清政府聲明，將不再與美方續約。

反對續約的聲浪也延伸到夏威夷群島的華人社會。1903 年，當地的《新中國報》編輯呼籲以抵制美貨行動，來報復美國對中國移民的不平等待遇。該報的一篇題為〈擬抵制禁例策〉的文章，被公認為最先提倡以「抵制」美貨方式對付美國的排華政策。¹⁹此後，美國各地的華人力勸在中國的同胞支持抵制美貨運動。他們一方面拍電報稟告清廷外務部，反對繼續進行中美續約磋商。另一方面也致電上海商務總會，請他們採取抵制美貨的行動。

美國華人可說是抵制運動的催生者。其實，不只是長居在美國的華人，一些政治流亡客，如保皇會的康有為和革命派的孫中山，都與美國華人的抵制運動有所關聯。當康有為和梁啟超等維新人物領導的戊戌變法失敗後，被迫流亡海外；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更是為清廷所不容，只能在海外活動。這些政治流亡客在海外為了爭取華人的支持，便各盡所能灌輸海外華人各自的政治思

¹⁶ *Boston Daily Globe* (Boston), Oct. 12-16, 1903.

¹⁷ 《中西日報》（三藩市，即舊金山），1900 年 3 月 4 日、6 月 12 日、26 日、8 月 16 日、19 日、9 月 2 日、17 日，以及 11 月 8 日。轉引自 L. Eve Armentrout Ma, *Revolutionaries, 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 33.

¹⁸ L. Eve Armentrout Ma, *Revolutionaries, 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p. 33.

¹⁹ 該文章收錄於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頁 588-597；另見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北京：三聯書店，1960），卷 1，冊上，頁 352-359。

想。儘管保皇派和革命派對未來中國理想政體的看法不同，對為達到目的而採取的方式也不一樣，但是他們對促進海外華人的政治覺醒及團結愛國的精神有顯著的貢獻。

海外華人並不是無條件呼應保皇派或革命派的號召，他們也要這兩派的領導者聽聽他們的心聲，和協助抒解他們的困境。所以，當康有為於 1905 年 6 月有機會覲見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時，康有為在會談中當面提到排華法令對華僑的傷害，並要求美國總統出面改善排華法令。²⁰1906 年初，康有為再次將美國華人的心聲傳達給美國總統，這次是以書函方式表達，長文議論禁約之弊。²¹

孫中山與美國華人抵制運動的關係更為密切，甚至將抵制運動與他的革命事業掛鉤。²²1904 年，孫中山旅美期間，曾著手修訂洪門組織致公堂的章程。他在序言中提到：「我堂同人在美國者，不下萬餘人，向以散居各地，人自各謀。……以此之故，為外人所輕藐所欺凌者，所在多有。」²³可知孫中山已深刻體驗到華僑在美所受的欺凌及苛待。隨後，孫中山在致公堂領袖黃三德的陪同下，巡迴美國大陸各城市，除了勸導洪門人士接受修正章程及施行總註冊的辦法外，孫中山也利用機會宣傳革命事業。值得注意的是，孫中山的跨州之行，「極受留學生與工人歡迎，時常在華人開設的洗衣店地下室後部，對他們講述清吏腐敗及國民自求解救的必要。」²⁴由於工人及學生正是美國排華政策的主要受害者，因此可以合理推測他們會與孫中山談及受苛待之情形。²⁵孫中山為

²⁰ Delber L. McKee, "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6 Reconsidered," pp. 178-180.

²¹ 〈康有為致美國總統論禁約書〉，《東華報》（澳洲雪梨），1906 年 2 月 10 日、17 日和 24 日。

²² 有關孫中山與抵制運動的關係，見黃賢強，〈孫中山與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 127 種，1996）。

²³ 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66），頁 390。

²⁴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2），冊上，頁 413。

²⁵ 孫中山此行的另一要事，便是發表一份英文宣言：“The True Solution of the Chinese Question”（中國問題之真解決）。他在這一篇宣言中，除了列出滿清十大敗政之外，也力闢所謂「黃禍」的謬論。美國人在十九世紀後期開始排華，與中國人大量移入美國而引起的「黃禍」恐慌有直接關係。吳相湘在討論此宣言中的黃禍論時，也提到：「孫先生對美國排華事，注意已久。」（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冊上，頁 415-416）。孫中山相信，若能化解美國人對黃禍之

了博取華僑的支持，便將排華法案的實行，歸罪於滿清政府的腐敗無能及護僑無力。

另一件事情雖然發生在 1905 年以後，但也可以看出孫中山有意識地將排華事件與革命事業掛鉤。孫中山在 1911 年 1 月再度訪美，馬不停蹄地奔走各埠，籌措革命款項。8 月間抵達鉢侖(Portland)，向 500 名華人發表演說，除了痛陳亡國之悲慘，及革命之利益外，他還提到：「倘吾中國能革命，開浚財源，到其時美人且往中國覓食，吾人倘何須作外人籬下之寄邪。」²⁶孫中山演講完畢，獲得聽眾鼓掌呼好，「震動檐壁，可謂盛矣。」²⁷可知孫中山懂得抓住華僑最關心的切身問題，即寄人籬下受虐待之苦，來爭取他們對革命的支持。因此也不難理解，自從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以來，美洲華僑更積極支持革命運動的原因，尤其可從華僑捐款數目的激增，明顯地看出差別。

當上海商人響應美國華人的號召，於 1905 年 5 月召開首次抵制大會後，抵制美貨運動正式揭開序幕。此後，美國華人繼續採取進一步行動，支持中國境內的抵制活動。他們在美國各地勸捐義款，匯回中國支援抵制活動的經費。²⁸他們也蒐集美國人對抵制運動的最新反應等消息，讓中國的抵制人士瞭解。

清末抵制美貨運動的發生，固然與中國內部的政治社會變化有密切的關係，例如民族主義的興起，資產階級商人的抬頭，新式學堂的設立，知識青年和婦女的崛起等，這些因素都有專著論述，不在此贅言。²⁹但美國華人對於抵制運動的形成，有著關鍵性的導火作用。

恐懼，也能緩和美國人對排華之態度。

²⁶ 蔣永敬編，《華僑開國革命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77），頁 122。

²⁷ 蔣永敬編，《華僑開國革命史料》，頁 122。

²⁸ 三藩市《大同日報》1905 年 7 月 1 日刊登之〈旅美華人拒約總會廣告〉，列明募款章程。該份報紙收藏於美國加州伯克萊大學 Bancroft Library。

²⁹ 有關廿世紀初期中國政治社會的變化，以及商人、學生、知識青年和婦女等階級的興起，可參閱以下相關論著：朱英，《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桑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Mary Wright, "Introduction," 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三、英屬新馬華人與近代中國： 從抵制美貨運動到革命運動

中國福建和廣東等地人民大規模移民到英屬新加坡和馬來亞，也是在十九世紀中葉開始，其中的推力和拉力關係上文已提到。與美國華人不同的是，新馬的華人並沒有明顯地受到英國殖民統治者的歧視，反而被他們充分利用來開發土地和經濟資源。因此，新馬華人並不是抵制美貨運動的發起者，但當抵制美貨運動在中國發生後，新馬華人却是積極地回應。為何會如此呢？其中因素值得探討。

其中一個因素，可以從新加坡當地主要華文報章的一則通告看出。《叻報》頭版公告中寫道：

美人限制華工禁約，經滬港粵垣各內地商會開議，力籌抵制。此事關切我國大局，凡我華商宜表同情。茲本坡華商擬於本月十八日（陽曆六月二十日）兩打點假座同濟醫院集眾商議，以保國體，而杜將來。³⁰

從這段公告的文字中，已經可以看出為何新馬華人會捲入這個原本只是中美兩國之間的糾紛。第一個原因是，南洋華人雖然身處異鄉，但仍然心繫家鄉和祖國。而且，絕大部份受美國排華政策所影響的華工，也和新馬華人一樣，來自東南沿海的廣東和福建兩省；一份對同鄉的感情和關心，促使他們積極參與這個「關切我國大局」的事件。其次，保障華工權益也與國家及民族的自尊相提並論。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外國交戰，屢戰屢敗，割地賠款已成慣例。外國人在中國境內又擁有治外法權和租借地，使中國人的自尊心受到嚴重的傷害；當政府無力維護國家尊嚴時，人民只好自力救濟。此刻商民爭取拒續苛約，正是要挽回民族的自尊心，也是「保國體」的具體行動。第三個原因是，他們擔心萬一美國的排華政策得以順利執行，新馬的殖民地主人——大英帝國——以後也會仿效而採取排華政策；果真如此，下一個受害者就是新馬的華人了。

³⁰ 《叻報》（新加坡），1905年6月17日。

因此，公告中所提到的「杜將來」，便是指要杜絕將來對新馬華人的禍害。簡言之，華人參與此運動具有三方面的意義：聲援同胞，維護國體，以及最重要的是保障自己將來的命運。

1905 年 6 月 20 日，新加坡反美集會如期舉行。大會的高潮是曾兆南、吳興季子（允列）和林文慶等人的演說，他們分別講演美國華工條約的苛刻，呼籲群眾支持上海等地的號召，「使美知眾志成城，亦眾怒難犯，則禍可中止。」³¹ 根據《叻報》的報導，這些聽眾來參加之前，已略知大會召開的目的，也略聞美國苛待華工的事實，所以前來之時已是「義憤之心形於詞色」。³² 聽了林文慶等人慷慨激昂的演講後，更是人心沸騰，全場騷動。隨即大家決定組成一個委員會，統籌抵制美貨事宜。林文慶被選為總理，本地四大幫派各推舉一名襄理，分別是閩幫的吳榮甲、粵幫的簡仁石、潮幫的曾兆南和客幫的張浪溪。³³ 他們首先執行的一件事，就是聯名致電北京政府及中國駐美公使梁誠，以及美國駐北京公使柔克義(William W. Rockhill)，表達反對續約的立場和抵制美貨的決心。英文稿由受英文教育的林文慶親擬，中文稿則由《叻報》前主筆葉季允所撰。全文如下：

（農曆）五月十八日新加坡眾華商集議，力助上海華人商會抵制美約之舉，並擬此後不與美國人交易，不買美貨及其製造各物，必待其將禁止華人入口之條切實廢去而後已，為此電稟。³⁴

6 月 20 日，新加坡同濟醫院的反美集會，並不令當地華人感到太過意外，因為自從上海總商會號召海內外各埠支持之後，新加坡的《叻報》即對在中國進行的抵制活動作過多次的報導和評論。根據統計，從 5 月 19 日到 6 月 19 日之間，至少有七則相關的報導和評論。³⁵ 例如，5 月 27 日題為〈華商愛國〉

³¹ 〈紀新嘉坡華商集議助拒美約事〉，《叻報》，1905 年 6 月 21 日。

³² 〈紀新嘉坡華商集議助拒美約事〉，《叻報》，1905 年 6 月 21 日。

³³ 〈紀新嘉坡華商集議助拒美約事〉，《叻報》，1905 年 6 月 21 日。

³⁴ 〈紀新嘉坡華商集議助拒美約事〉，《叻報》，1905 年 6 月 21 日。

³⁵ 《叻報》上的七則報導分別是：5 月 19 日〈電請拒約〉，5 月 27 日〈華商愛國〉及〈粵垣會議抵制華工事〉，6 月 13 日〈錄上海中美官商會商禁約事〉，6 月 15 日〈力爭禁約〉，6 月 17

的報導中，相當詳細地記載了上海紳商在商業總會的開會情形，以及粵幫和閩幫領袖分別在其會館的商議情形。³⁶

新加坡是南洋地區的交通樞紐，從中國南來的勞工通常先到新加坡，再轉往馬來半島和荷屬東印度群島各地。同樣地，很多有關華人的訊息也是從新加坡傳播出去。例如，林文慶在新加坡的集會結束後，便馬上致函檳城華商，請求共襄盛舉，於是抵制美貨運動的浪潮很快地傳到檳城。

6月27日，檳城紳商在平章會館召開大會。臨時議長林克全首先「宣明會議宗旨，以為宜與上海、新加坡等處協同辦理。」³⁷另一位籌辦人辜禎善隨後「將新加坡華人大醫生林君文慶致本嶼華商之函宣讀，大都勸勉吾人同心合德，以抵制美約而爭國體之說。」³⁸接著發言的是伍連德醫生，他呼籲當地各界人士要團結一致，才能迫使美國知難而退，放棄重訂苛約的計畫。而且，伍也知道與其他地區華人合作的重要性，他強調：「我等必宜與上海，石叻（新加坡）等處互相附和，永不用美國貨以抵制之，使彼貨之銷場大窒，知吾愛國保種之熱心。若不翻然改訂苛約，吾人亦永弗懈也。」³⁹其他發言支持的商紳還包括林成輝、溫文旦和謝德順等人。會議結束前，與會者達成三點決議：（一）檳城支持上海商務總會的號召，抵制美貨。（二）拍電報給滿清政府外務部和商務部，以及上海商業總會，表達檳城商民支持抵制美貨的決心。（三）公推領袖10人，負責推動抵制美貨活動。閩籍和粵籍紳商各5人，分別是林克全、林耀煌、溫文旦、吳世榮、辜立亭、梁樂卿、鄭大平、葉寅階、伍信時和陳炳貴。⁴⁰

經過新加坡和檳城的二場誓師大會後，新馬各地的抵制美貨活動如火如荼

日〈請華商籌抵美事〉，以及6月19日〈同籌拒約〉。

³⁶ 《叻報》，1905年5月27日。

³⁷ 〈會議抵制美國禁約特紀〉，《檳城新報》（檳城），1905年6月29日。

³⁸ 〈會議抵制美國禁約特紀〉，《檳城新報》，1905年6月29日。

³⁹ 〈會議抵制美國禁約特紀〉，《檳城新報》，1905年6月29日。

⁴⁰ 《檳城新報》，1905年6月29日；《叻報》，1905年7月3日；*Straits Times* (Singapore), July 3, 1905.

地展開。在雪蘭莪州的吉隆坡，以及吡叻州的怡保、太平、安順、金寶和務邊等地，先後都有類似的集會。

1905-1906 年，新馬抵制運動有三個特點：其一是此運動深入社會各階層。在新馬地區的發起人雖然是華人紳商和華社領袖，但參與者還包括小商人、勞工，甚至是社會更下層的人物如妓女等。特點之二是宣導方式多樣化。抵制美貨運動得到新馬各階層人士的支援，與宣傳工具的多樣化有密切的關係。主要的宣傳方法包括靜態的報章評論和報導，以及動態的方式如歌謠誦唱、公開演講和戲劇演出等。⁴¹

第三個特點是，這是個跨政治黨派的政治社會運動。過去研究二十世紀前十年的新馬華人社會和政治，都偏重於保皇黨和革命派的活動及其影響。保皇黨的康有為和梁啟超等人的確對喚醒新馬華人的愛國意識作出貢獻；革命派的尤列和孫中山等人也確曾催生了新馬華人的民族主義。這兩派還常為爭取華人的支持而互相攻擊，並分別透過《南洋總匯報》和《中興日報》等文宣工具作為喉舌，批評和打擊對方。⁴²但從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的發展，可以看出當時華人的政治立場並非如楚河漢界般地分明，但也不能簡單地分為兩個敵對的陣營，因為他們會為一個更現實的利害關係而拋開政治偏見，共同支持抵制美貨運動。這個現實的利害關係是牽涉到他們的工作機會和生存權益。他們參加抵制運動，最主要還是擔心如果讓美國如願地禁止華人入境及迫害華人，英國人也會仿效；那麼，在英國殖民地謀生的新馬華人也會深受其害。不但他們家鄉的親友將無法來南洋謀生，甚至已在新馬工作和定居的華人也會有被驅逐出境的可能。

他們的擔憂也不是沒有根據，因為英國的另一個殖民地澳洲，在十九世紀末已採取排外政策，以語言測驗等方法來限制中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移民數

⁴¹ 有關新馬抵制運動首兩個特點的討論，詳見黃賢強，《海外華人的抗爭：對美抵制運動史實與史料》，第 3 章。

⁴² Ching Hwang Yen,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00-106.

量。⁴³在抵制美貨期間的一些報章評論，可發現不少顯示新馬華人隱憂的證據。在一篇評論中，作者明白地指出，若讓美國得逞一次，則後患無窮：「一美為之前，百美繼其後。美約不爭，各國聞風踵起，五洲雖大，我華人將無立足之基矣……此時若不聯合同胞實行抵制，他日列強效尤，前途何堪設想。」⁴⁴有一首粵謳，更明白地唱出當時華人的恐懼感，歌詞中提到，若現在不團結一致，將來便會成為任人宰割的奴隸。⁴⁵

由於當時新馬華人有這方面的憂患意識，使得他們不分黨派或政治背景，為共同的利益而團結合作。從各地抵制活動領導人的背景即可證明，其中有革命派、保皇派，也有些是沒有明顯的派別色彩，或對政治漠不關心的商人，甚至有不少土生土長的華人。主辦馮夏威追悼會的陳楚楠和張永福是革命派支持者，在檳城平章會館的會議中，其中一個華人領袖吳世榮，他是日後最積極支援孫中山的革命派人物，也是同盟會檳城分會的負責人。

另一方面，曾經是保皇派支持者的新馬才子丘菽園，對抵制活動也很熱心。在新加坡牛車水的一個集會上，丘菽園等人激情演說，獲得同胞的回應。根據報章記載：

丘君菽園、高君耀祺，互相演說，代表同情。在座諸君，聞風興起，為之動容，甚至蘋果、香水等物，稍屬美貨，概不准用。若二君者，可謂不遺餘力，喚醒同胞。⁴⁶

在吡叻州最熱心支持抵制活動的富商胡子春，則是保皇黨的中堅分子。⁴⁷當孫中山於 1906 年在新加坡成立同盟會新加坡分會後，原本打算繼續北上馬來半島各大城市，以組織更多的分會，但孫中山一行人到達怡保後，受到胡子春的

⁴³ 黃昆章，《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廣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頁 54；楊進發著，姚楠、陳立貴譯，《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 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頁 18-19；劉渭平，《澳洲華僑史話》（台北：海外文庫出版社，1958），頁 18。

⁴⁴ 〈敬告大霹靂新改良商局紳董書〉，《檳城新報》，1905 年 9 月 6 日。

⁴⁵ 〈真正要發奮〉，《檳城新報》，1905 年 8 月 29 日。粵謳為粵語民歌謠的一種。

⁴⁶ 《拒約報》（又稱《廣州旬報》），1905 年第 8 期，頁 11。

⁴⁷ 胡子春的政治立場，表面上是傾向保皇黨，實際上是擁護清廷。見顏清滄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頁 301。

威脅恐嚇，只停留一個晚上，便匆匆折返新加坡。但胡子春對抵制活動的支持，卻與革命派人士一致，在吡叻州的一次捐款活動中，胡子春是最慷慨的捐款人。⁴⁸

對政治並不很關心的著名富商余東旋，也多次在各地捐獻大筆款項給抵制組織。在吡叻州金寶和務邊的捐款活動中，余東旋都名列榜首。⁴⁹本地土生土長的林文慶，在 6 月 20 日新加坡舉行的反美大會中被選為抵制活動的領導人。林從小受英文教育，留學英國習醫，回國後還擔任殖民地立法議會議員。另一位與林文慶出身背景相似的土生華人是伍連德。伍出生於檳城，同樣是受英文教育，且獲得英女皇獎學金赴英學醫，學成後回到南洋行醫，因熱心公益而成為當地社會的領袖。在 6 月 27 日平章會館的集會中，伍還以英語發言，呼籲華人團結一致，抵制美貨。

不論是保皇派或革命派的支持者，或是無政治色彩的華人都對抵制活動支持。最主要的原因是當時華人社會對抵制美貨運動已形成一種共識。華人對國家、民族、同胞的關懷和自身利益的關心，已經超越黨派之爭。不僅從人物的政治背景分析可以看出，這抵制美貨活動是個超黨派的社會運動；從參與者的社會階層也可以看出，這是個跨階級的社會運動。除了所提過的領導人多數是富商和醫生等專業人士外，參與者還包括許多小商人、文化界工作者如《叻報》的葉季允和《檳城新報》的編輯與主筆，以及勞工階級如碼頭工人，甚至是戲劇演員和妓女也不落人後，可以說是新馬華人最早的群眾運動之一。當人民的團體意識被喚醒後，他們就比較容易再次受到動員。這個抵制美貨運動最重要的影響之一，便是為 1905 年以後新馬各階層華人積極參與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運動，奠下更穩固的群眾基礎。

⁴⁸ 〈大小吡叻捐助廣濟醫院拒約公所經費〉，《檳城新報》，1905 年 10 月 4 日。

⁴⁹ 〈金寶蘭埠捐助拒約會經費交廣濟醫院總拒約會芳名〉，《檳城新報》，1905 年 11 月 13 日；〈務邊埠各號簽捐抵制美貨〉，《檳城新報》，12 月 7 日。

四、澳洲華人與近代中國：保皇會與抗美運動的關係

華人移入澳洲的時間和動機與美國華人非常類似。十九世紀中葉，澳洲的金礦被發現後，吸引不少來自中國的淘金客，也有一部份華工是從南洋地區移入的。在以後半個世紀，華工陸續湧入澳洲，在澳洲的六大州裡，都可以發現華工的足跡，尤其是新南威爾士州(New South Wales)、維多利亞州(Victoria)和昆士蘭州(Queensland)。在華人聚居的城鎮，華人社會也逐漸形成，「唐人街」和會館等社團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開始出現在澳洲的一些主要城鎮，如雪梨(Sydney)和墨爾本(Melbourne)等。

另一方面，華人的大量移入也引起澳洲白人的不滿。澳洲白人雖然也是移民，但這些比華人更早來到澳洲的歐洲移民，許多已在澳洲落地生根，並建立了他們的政府。他們視澳洲為他們的土地，不願讓華人移民來分享他們的財富。1854年以來，在一些礦區便發生種族衝突和排華事件。⁵⁰一些州政府甚至通過各種限制華人移民的法案，如船隻限載和人頭稅等，擬從根本上解決華人移民問題。

在1900年和1901年世紀之初時，澳洲有兩件事值得特別注意。第一件是華人社會中的大事。1900年1月14日，澳洲華人於雪梨成立第一個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團體：新南威爾士保皇會，⁵¹該會的成立是受到保皇派領袖康有為的影響。康有為曾於1899年10月寫信給雪梨華人領袖梅光達，要求他成立一個救國組織，以協助光緒皇帝復位。康有為的信中也強調，只要中國政治上了軌道，便有能力保護海外的僑民。⁵²新南威爾士保皇會的創始人主要是當地的成功商人，包括劉汝興、葉炳南、葉同貴、陳聯科、鄭蕃昌、李官益、李益徽和郭標等。兩位知名的報紙編輯伍萼樓和鄭祿也是保皇會的會員，這對保皇運動

⁵⁰ 楊進發著，姚楠、陳立貴譯，《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年》，頁15。

⁵¹ 有關澳洲保皇會的成立和活動，參見趙令揚、楊永安，〈晚清期間澳大利亞的保皇活動及其與革命思潮間的矛盾〉，《明清史集刊》，1999年第4期，頁6-7。

⁵² 《東華新報》（雪梨），1899年10月11日。

的宣傳有很大的幫助。⁵³新南威爾士保皇會的主要任務是籌募愛國捐款，支援康有為等人的保皇運動；但要僑民慷慨捐獻，必須先要喚醒僑民的愛國意識。因此，澳洲保皇會的成立，掀起澳洲華人愛國運動的序幕。

上世紀之初的另一件大事，是新成立的澳洲聯邦政府正式頒布了「白澳政策」。英屬澳洲的六個殖民地於 1901 年 1 月 1 日組成聯邦政府，並正式脫離英國而獨立。澳洲聯邦政府通過的第一個法案是「移民限制法案」，即所謂的「白澳政策法案」。該法案授權政府採用語言測驗法，作為限制有色人種移民的一項措施。在這項措施下，所有移民都要能聽寫 50 個歐洲文字（不限於英文）才能獲准入境。這個措施雖然是針對所有移民，但矛頭明顯指向中國移民，因為當時非白人移民中，以中國人佔絕大多數。而且，一般中國移民是絕對不可能通過這項語言測驗。因此，在幾乎沒有新的華人移民入境情況下，澳洲華人的的人數開始減少。即使在語言測驗措施實行前已定居澳洲的華人，也在白澳政策的陰影和排華情緒緊張的環境下，產生嚴重的危機感。

當抵制美貨運動於 1905 年 5 月開始，陸續在中國各地和東南亞華人社會熱烈展開時，澳洲華人也參與抗議美國排華行動。澳洲華人的抗美運動，主要歸功於保皇會的領導和宣傳。各階層的澳洲華人群眾捐款，支持抗議美國的排華行徑，也和他們在澳洲的困境和危機感息息相關。換言之，廿世紀之初澳洲華人的政治覺醒和白澳政策的衝擊，是澳洲華人積極參與似乎與他們沒有直接關係的反美運動的最重要因素。但澳洲華人抗美運動的動機、性質、領導人和宣傳等方面，都有它的特殊性，與中國國內、美國和新馬地區的抵制美貨運動不完全一樣。

首先，澳洲華人參與抗美運動的動機，不純粹是基於關懷美國的華僑，同時也是想借題發揮。因為自從 1901 年澳洲政府實行白澳政策後，澳洲華人深受排華政策的折磨。白澳政策不只斷絕了中國人移民澳洲的管道，也使留在澳洲的華人備受種族歧視。他們支持抗美運動，是希望美國在受到壓力下能改善

⁵³ 楊進發著，姚楠、陳立貴譯，《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 年》，頁 172。

排華例律，進而影響澳洲政府改變對華人的不公平待遇。因此，澳洲華人的抗美運動可說是救人救己的愛國運動。

其次，澳洲華人的反美方式，主要是表達抗議，而非抵制美貨。因為澳洲華人人數不多，如果採取抵制美貨，對美國經濟和商業上影響作用不大。在中國，抵制美貨的效果比較顯著，因為中國的人口多，這對美國而言，是非常龐大的潛在市場。如果中國的抵制運動成功的話，對美國的商業和貿易是重大的打擊。澳洲華人沒有這種影響力，因此改以紙上談兵，以電函抗議，來表達對美國的不滿。因此，澳洲華人的反美運動在性質上是一種抗議運動，而非抵制美貨運動。

第三，澳洲的抗美運動是由保皇派所領導和推動。雖然不是所有的活動支持者都是保皇派的追隨者，但澳洲（新南威爾士）保皇會的創始人都是抗美運動的核心分子，如商人劉汝興和葉炳南，以及報紙編輯伍萼樓和鄭祿等人。⁵⁴因此，從抗美集會到報章的宣傳，主要都是由保皇會的領導人在推動。這也印證了一般看法，即 1908 年以前保皇派在澳洲華人社會中是一枝獨秀，沒有受到革命派的挑戰，因為革命派的勢力還沒有伸展到這片南方大陸。⁵⁵滿清政府的影響力也很小，因為滿清政府要到 1908 年 5 月才在澳洲設立領事館，並開始有專責機構進行監督和籠絡華僑的工作。⁵⁶這種以保皇會為主導的抗美運動，與中國的抵制美貨運動，或新馬的抗美運動都不相同。在中國主要是由商人號召，學生推動，大眾支持。在新馬，是由華社領袖（商人和知識分子）號召和推動，大眾支持。而且，無論是中國或新馬，保皇派不是唯一支持抗美運動的政治派系，革命派的領導人也積極參與抗美運動，與保皇派平分秋色。

⁵⁴ 有關保皇會的創會職員名單，見雪梨新南威爾士保皇會會議紀錄，1900 年 1 月 14 日。轉引自楊進發著，姚楠、陳立貴譯，《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 年》，頁 172。

⁵⁵ 1909 年墨爾本(Melbourne)華僑創辦《警東新報》，開始鼓吹革命；繼組新民啓智會，宣傳救國，力抗保皇會，是為革命派在澳大利亞發展的開端。邵銘煌，〈前進南太平洋：孫中山革命運動在澳洲(1910-1924)〉，「第七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父紀念館，2004 年 3 月 26-27 日。

⁵⁶ 第一位清朝駐澳大利亞總領事是梁瀾勛，任期是 1908 年 5 月至 1910 年 11 月。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82。

第四，在宣傳方面，澳洲華人的抗美運動也是相當特殊。由於澳洲華人散居在各州各地，比較難以群眾大會的方式進行宣傳（雪梨和墨爾本的唐人街除外）。因此，報紙便成了最佳宣傳工具，其中又以雪梨的《東華報》最為重要。《東華報》儼如抗美運動的宣傳中心，不只報導各地抗美活動的消息，刊登鼓舞人心的評論文章，以及煽動情緒的歌詞和輓聯，更是義款的收集和匯寄中心。⁵⁷

總結而言，澳洲華人抗美運動雖源自於中國的抵制美貨運動，但由於環境和社會等各方面的條件有別，以致澳洲華人的反美活動有明顯的特質。研究澳洲的抗美運動，除了能清楚該運動在澳洲的發展外，也有助於瞭解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抵制外貨運動的複雜性；同時，也能加深對海外華人社會與中國政局互動關係的理解。

五、抵制運動、海外華人與中國近代史

（一）從海外華人的參與再論抵制運動的性質

廿世紀初的抵制美貨運動，在 1950 和 1960 年代時被定位為反帝國主義的愛國運動。1970 年代末的改革開放以來，這個抵制運動被認為是資產階級，尤其是新式商人的愛國運動。近幾年來，一些學者專家開始從「市民社會」的角度或「近代性」的特徵，以及「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來論述這個運動的特性。但如果將海外華人的抵制活動也列入考慮的話，抵制運動的性質可能比目前所知道的還要複雜。

海外地區的抵制活動與中國境內的抵制運動在很多方面有不同之處。而且，不同地區的海外華人社會，如美國、新馬和澳洲等，當地華人參與的動機

⁵⁷ 根據統計，《東華報》從 1905 年 10 月初到 1906 年 7 月初的九個月裡，總共刊登了 130 則捐款芳名錄，計有 5,730 個人、514 商號和 22 會館團體等，共捐獻 2,441 英磅和 1,214 銀元 293 毫的義款。見黃賢強，《海外華人的抗爭：對美抵制運動史實與史料》，頁 153-159。

以及參與者的身分等，都不盡相同。

在參與者的動機方面，美國華人發起抵制運動，是要抗議美國的排華政策和爭取廢除禁工條約。美國檀香山《新中國報》刊載的〈擬抵制禁例策〉一文的最後一段：「正告我華僑同胞……今日換約之期急矣，我輩當冒萬險，持一意，以貫徹始終，決意興辦此事。」⁵⁸在這被公認為最早提出詳細的抵制理由和方法的議論文中，所謂的「此事」，即抵制之事也。文中清楚言明，發動抵制的動機，是希望在禁工條約即將期滿，是否要續約或廢約之際，表達他們的訴求。因此，對美國華人而言，抵制運動的性質比較單純，主要是事關他們切身的利益，不得不爭取廢約。

新馬華人參與抵制的最主要動機，也是要保護自己長遠的利益，以防英國殖民地政府會仿效美國而採行排華政策。在有關抵制活動的當地報導中，可看出端倪。例如，新加坡抵制團體致南洋各埠華人的勸說函中透露，合作和參與拒約抵制活動，不只是「解數十萬同胞倒懸之苦滄，作萬家之生佛」，更可以「斷別國後來藐視之地步」。因此抵制運動與新馬南洋華人的生計是「休戚相關，齒頰相輔」。⁵⁹而其他動機和因素都是次要的，或是後來發展的結果。譬如，對同胞的同情是自然的感情流露，不一定會激發抵制行動；而保國體的意識是政治流亡客的宣傳結果，不是新馬華人參與抵制禁約的主要誘因。

澳洲華人回應抵制運動的動機，主要是當地華人將美國的排華政策與澳洲的「白澳政策」等同看待，希望海內外華人對美抗爭成功，有助於影響澳洲政府放棄歧視亞洲移民的白澳政策。因此，澳洲華人的抗美運動可說也是與切身利益息息相關。

在參與者的身分方面，中國境內的抵制運動，是由商人首先號召和領導，不久知識分子和學生便取而代之，成為抵制運動的主要推動者，最後發展成社會各階層的人民都參與的政治社會運動。海外華人社會的抵制運動則有所不

⁵⁸ 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頁 597；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 1，冊上，頁 359。

⁵⁹ 《檳城新報》，1905 年 12 月 16 日。

同，例如，美國華人的抵制活動，一開始各個階層和身分的華人都參與。當時的廢約和抵制運動是官民攜手合作的一件大事。官是包括清朝駐美公使梁誠，民是包括領導三藩市中華會館的紳商僑領、報界和宗教界人士（如伍盤照牧師）、⁶⁰秘密會社的致公堂（如大老黃三德和他的追隨者），還有廣大華工大眾等。而且，開始時並沒有反清的意識；美國華人的抵制運動攙雜反清意識，是由於後來政治流亡客見有機可乘，利用支持抵制運動作為達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手段，以吸引華人認同他們的政治理念。

新馬地區的抵制活動，也是不同社會階級和身分人士都參與的社會運動。最初響應上海商會號召抵制運動的，不是商界的領袖，而是當地的華人領袖林文慶。林文慶是土生華人，受英語教育及留學英國的醫生。其他推動者是當地各方言群（如廣府幫、福建幫、潮州幫和客家幫等）的領袖和新聞界的負責人等。各個方言群的領袖，大部份是商界的殷商，但他們被公認為領袖，主要不是因為他們的財富，而是在各自的方言群會館中的領袖地位。在有效的宣傳下，新馬的抵制活動很快地受到社會各階層人士的支持和呼應，也包括同情保皇會或支持革命派的人物。但大部份參與者是沒有政治傾向的，或是不太關心中國政治的土生華人。因此，嚴格而言，新馬的抵制活動不能認為是因為民族主義的高漲所造成，反而是因為經過抵制運動的磨練，造成民族主義得以發酵，影響後來革命運動的順利發展。因為抵制運動是一個很好的思想教育機會，也是一個很好的行動磨練機會。

澳洲華人的抗美運動也是跨社會階層的，從有關的捐款名單可以看出，絕大部份的捐款者是華工大眾。而且，與美國華人和新馬華人比較，澳洲華人人口稀少且分散各地。在鄉鎮和礦區的華人，沒有商人階級領導，沒有學生的推動，他們參與抵制運動，主要因白澳政策給他們切膚之痛。

⁶⁰ 有關伍盤照對 1905 年抵制美貨的看法，見其自述：Ng Poon Chew, *The Treatment of the Exempt Classes of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atement from the Chinese in America* (San Francisco, Calif.: n.p., 1908)。此資料收藏於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亞裔美人研究圖書館伍盤照檔案，編號 1-20。

因此，以海外華人的動機以及參與者的複雜身分而言，海外華人發起和響應抵制運動，主要是與他們在當地受到的待遇或潛在憂患意識有關，而與愛國主義、民族主義、反帝思想等的關係薄弱，至少不是主要的導因。由於海外華人社會的特性，海外地區的抵制運動與民族資本家的興起，或商人階級的抬頭，或市民社會的形成，或近代性民族主義的形成等因素，都沒有直接的關聯。

抵制運動在海外地區後期的發展，各地也不一樣。在美國，保皇會、革命派領袖和支持者積極介入，分別推動抵制活動；在新馬，革命派比較佔上風，大部份抵制運動的舵手，後來都成為革命運動的領袖；在澳洲華人社會，保皇會的勢力在當時一枝獨秀，整個抗美運動的過程中具有政治意識的華人領袖，幾乎都是保皇會的人物。因此，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成分，的確攙雜在後期的抵制運動中。但從因果的關係而論，應該是抵制運動促成民族主義運動和愛國主義運動在海外華人社會的滋長，而不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促成海外的抵制運動。

（二）論抵制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

上文提到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不是抵制運動的導因，並不表示該運動與清末的革命運動無關。其實，該運動對革命運動的影響是深遠和直接的。抵制運動的動員和宣傳，為革命事業的發展播下種子。革命派的勢力在 1905 年之後取得很大的進展，當然有國內政治發展的因素，尤其是同盟會成立之後，原興中會的成員和華興會的勢力結合，再加上光復會和共進會等自主性比較強的政治團體的活動，使革命派的整體實力增強，支持者也從知識分子擴及會黨和新軍等。革命派的勢力在 1905 年之後大幅成長，也可以從同盟會陸續在海外各地成立分會看出端倪。雖然 1905 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和因素，但海外各地相繼成立分會或支會，也與抵制運動的結果有關。

抵制運動對海外華人而言，是歷經一次政治社會運動的洗禮，或許也是他們移民異鄉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動員活動。這些動員組織的方法和經驗，都為同盟會的組織奠下基礎；許多同盟會的領導人，都曾經參與或領導海外的抵

制活動。

以新馬爲例，1906 年同盟會新加坡分會成立時，正副會長爲陳楚楠和張永福。這兩人是孫中山在新加坡的得力同志，也是抵制運動的主要推動者。陳楚楠和張永福的革命事業，已爲人熟知，其中包括他們協助安排孫中山到馬來亞各地去活動，並籌組各地的分會。兩人對抵制運動的貢獻，也是明顯可見，其中包括籌辦 1905 年 12 月於同濟醫院舉行的追悼馮夏威大會；這次的追悼大會，掀起新加坡抵制運動的一波高潮。在檳城，抵制運動的號召者是吳世榮；1905 年 6 月 27 日，檳城抵制運動的大會就是由他揭開序幕。次年，陳楚楠等人受孫中山付托，到檳城組織同盟會檳榔嶼分會，而第一任會長就是當地抵制運動的舵手吳世榮。1910 年 11 月，革命運動史上最重要會議之一的「檳城會議」，即是由吳世榮作東；出席這個策劃「黃花崗之役」的重要人物包括孫中山本人，還有黃興、胡漢民、趙聲、孫眉和戴季陶等人。其他曾經領導檳城的抵制運動，後來也積極參加革命運動的還包括辜立亭等人。

美國方面，曾直接參與抵制美貨運動，且成爲革命黨活躍成員者，包括三藩市同盟會的主持人李是男。李是男出生於美國，1905 年夏天抵制美貨運動展開時，他正好返鄉，由於受到抵制風潮的影響，革命思想油然而生。⁶¹他在故鄉臺山縣西寧市與李自重等人組織「臺山聯志社」。該社常集會，並常以外交失敗爲題，排斥滿洲政府，可謂「名爲拒約，實爲宣傳革命。」⁶²李是男於 1906 年加入香港同盟會，次年返美，並經馮自由的介紹，會見三藩市《大同日報》的唐瓊昌、劉成禹，及致公堂的黃三德等人，共商組黨救國事宜。⁶³1909 年，李是男與同志黃伯耀、溫雄飛等人秘密組織同盟會，對外使用「少年學社」名義，並發行《美洲少年周報》，宣揚革命。次年，三藩市同盟會正式成立，李是男被委任爲會長。不久，美洲各地分會陸續成立，會務逐漸發展。同時，《美洲少年週報》也改成《三藩市少年中國晨報》，爲美洲同盟會的喉舌。該

⁶¹ 馮自由，〈革命逸史〉（台北：商務印書館，1953），冊 2，頁 272。

⁶²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頁 111。

⁶³ 馮自由，〈革命逸史〉，冊 2，頁 272。

報的發刊詞特別以美國禁工條約及苛待華工的事實，來爭取華僑的認同及支持：

我同胞今日之覓食外洋者，備受外人種種苛虐，如奴隸、如牛馬、如草芥……血淚無處不流……就近以美國論，特立禁工之約，已不以人道待我矣……欲禦強鄰之苛虐，必回復我民族獨立之性而後可……必傾覆現在強奪專制惡劣貧乏之大清政府而後可。⁶⁴

由此可知，抵制美貨的主因——華工禁約和苛待華人——是革命黨人號召華僑支持革命的最佳宣傳工具之一。

澳洲方面與美國和新馬的情形不一樣。革命派的勢力在 1908 年以前的澳洲，可以說是無足輕重，因為絕大部份有政治傾向的澳洲華人，都是支持保皇會者。可以說保皇會的勢力在當時的澳洲是一枝獨秀，大部份領導抵制運動的會館領袖也都是保皇會的支持者。因此，抵制運動的領袖是與澳洲保皇會的領袖掛鉤。由於保皇派與清末政治社會變遷的關係也是密切的，因此討論澳洲華人的抗美運動，也不是與清末歷史完全無關。

六、代結論：三個問題的反思

本文對海外華人參與抵制運動的動機、性質，以及與近代中國政治社會運動的關係等三方面，儘管論述未盡周詳，但本文應該可以讓學術界重新對這個清末的群眾運動作出一些反思。其中包括：（一）如何將這個運動在中國歷史上定位。到底這個抵制運動，只是中國歷史上眾多歷史事件中一個影響力微小的事件？還是比目前的定位還要重要？基本上，目前對這個抵制運動的討論，主要屬於二十世紀抵制外貨運動史或排外運動史的研究範圍，我們是否也應該將它列入近代中國政治社會史的討論範圍內？（二）在清末革命運動史的討論中，往往忽略抵制美貨運動的重要性，甚至略而不談，即使有論及，也認為抵

⁶⁴ 蔣永敬編，《華僑開國革命史料》，頁 169-171。

制運動是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結果。但從本文的討論來看，我們是否應該更審慎地研究其中的因果關係？至少從大部份海外華人地區的情形而論，民族主義的興起，主要是抵制運動的結果，而非主因。（三）在全球化的時代，當我們質疑西方的史學者是否仍然以西方的角度和觀點論述中國歷史時，我們在論述與海外華人有關的歷史事件時，是否也要避免陷入以中國為中心的論述？多注意和應用海外華人的史料，多注重海外華人的想法和處境，或許能幫助我們更客觀地討論一些與海外華人有關的歷史事件或政治社會運動。

徵引書目

一、報章、史料

《大同日報》（舊金山），1905。

《中西日報》（舊金山），1900。

《叻報》（新加坡），1905-1906。

《拒約報》（廣州），1905。

《東華報》（雪梨），1905-1906。

《東華新報》（雪梨），1899。

《檳城新報》（檳城），1905-19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和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

蔣永敬編，《華僑開國革命史料》。台北：正中書局，1977。

Bevans, Charles I., comp. *Treaties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776-1949*.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Boston Daily Globe (Boston), 1903.

Straits Times (Singapore).

二、專書

不著撰者，《1905年上海人民的反美愛國運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編輯委員會編，《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

中科院廣州哲科所和中山圖書館編，《1905年廣東反美愛國運動資料彙輯》，第4輯。廣州，1960年油印本。

- 朱士嘉，《美國迫害華工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8。
- 朱 英，《辛亥革命時期新式商人社團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 吳相湘，《孫逸仙先生傳》，冊上。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2。
-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啓蒙運動，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沈己堯，《海外排華百年史》。香港：萬有圖書公司，1970。
- 周美綺，《1905 年的反美愛國運動》。北京：中華書局，1962。
- 阿英編，《反美華工禁約文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桑 兵，《晚清學堂學生與社會變遷》。台北：稻禾出版社，1991。
- 張存武，《光緒卅一年中美工約風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 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1966。
- 張枏、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卷 1，冊上。北京：三聯書店，1960。
- 曾業英等編，《近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0。
- 馮自由，《中國革命運動二十六年組織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48。
- 馮自由，《革命逸史》，冊 2。台北：商務印書館，1953。
- 黃昆章，《澳大利亞華僑華人史》。廣州：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
- 黃賢強，《海外華人的抗爭：對美抵制運動史實與史料》。新加坡：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2001。
- 楊國標等著，《美國華僑史》。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 楊進發著，姚楠、陳立貴譯，《新金山：澳大利亞華人，1901-1921 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
- 劉渭平，《澳洲華僑史話》。台北：海外文庫出版社，1958。
- 顏清煌著，李恩涵譯，《星馬華人與辛亥革命》。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2。

- 菊池貴晴，《中国民族運動の基本構造：對外ボイコットの研究》。東京：大安出版社，1966。
- Chew, Ng Poon. *The Treatment of the Exempt Classes of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atement from the Chinese in America*. San Francisco, Calif.: n.p., 1908.
- Ma, L. Eve Armentrout. *Revolutionaries, Monarchists, and Chinatowns: Chines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 McKee, Delber L. *Chinese Exclusion versus the Open Door Policy, 1900-1906: Clashes over China Policy in the Roosevelt Era*. Detroit, Michigan: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Remer, Charles F.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ir Economic Effectivenes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 Tsai, Shih-shan Henry. *China and Overseas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Fayetteville, Ark: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83.
- Wang, Guanhua. *In Search of Justice: The 1905-06 Chinese Anti-American Boycot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Wong, Sin Kiong. *China's Anti-American Boycott Movement in 1905: A Study in Urban Protest*. New York: Peter Lang, 2002.
- Yen, Ching Hwang. *The Overseas Chinese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Singapore and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三、論文

- 〈1905年廣東人民反美運動大事記〉，《廣東歷史資料》，1959年第2期，頁44-62。
- 丁又，〈1905年廣東反美運動〉，《近代史資料》，1958年第5期，頁8-52。

- 王立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抵制美貨運動〉，《歷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21-33。
- 王冠華，〈愛國運動中的「合理」私利：1905 年抵貨運動夭折的原因〉，《歷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頁 5-21。
- 吳金平，〈美國華僑與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0 年第 1 期，頁 35-41。
- 沈雨梧，〈1905 年反美愛國運動與浙江資產階級〉，《杭州師範學院學報》，1982 年第 3 期。
- 邵銘煌，〈前進南太平洋：孫中山革命運動在澳洲(1910-1924)〉，「第七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台北：國父紀念館，2004 年 3 月 26-27 日。
- 金希教，〈抵制美貨運動時期中國民眾的「近代性」〉，《歷史研究》，1997 年第 4 期，頁 92-107。
- 郝貴遠，〈柔克義與抵制美貨運動〉，《歷史檔案》，卷 26 期 2，1987，頁 95-100。
- 郝貴遠，〈梁誠與抵制美貨運動〉，《華僑華人歷史研究》，1991 年第 4 期，頁 47-60。
- 黃和英，〈百年前美國石泉城屠殺華工事件〉，《傳記文學》，卷 45 期 3，1984，頁 65-72。
- 黃賢強，〈孫中山與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新加坡：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學術論文第 127 種，1996。
- 趙令揚、楊永安，〈晚清期間澳大利亞的保皇活動及其與革命思潮間的矛盾〉，《明清史集刊》，1999 年第 4 期，頁 1-31。
- McKee, Delber L. "The Chinese Boycott of 1905-1906 Reconsidered: The Role of Chinese American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5: 2, 1986, pp. 165-191.
- Rhoads, Edward J. M. "Nationalism and Xenophobia in Kwangtung, 1905-1906:

The Canton Anti-American Boycott and the Lienchow Anti-Missionary Uprising,” *Papers on China*, No. 16, 1962, pp. 154-197.

Stratton, David H. “The Snake River Massacre of Chinese Miners, 1887,” in Arif Dirlik, ed., *Chines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Lauhan,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p. 215-230.

Wong, Sin Kiong. “The Genesis of Popular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 A Study of the Anti-American Boycott of 1905-06,” Ph. 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1995.

Wright, Mary. “Introduction,” in Mary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Yen, Tzu-kuei, “Rock Springs Incident,” in Arif Dirlik, ed., *Chinese on the American Frontier*. Lauhan,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p. 355-366.

Overseas Chinese and Modern China: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1905 Anti-American Movement

Wong Sin Kiong*

Abstract

Chinese, Japa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who have done research on the 1905 Anti-American movement have primarily focused on the boycott campaigns in China proper. Scholars have neglected the involvement of the Chinese who lived overseas in the movement. This article first discusses why and how the Chinese overseas, especially those in America, British Malaya, and Australia, were involved in the boycott, which was first initiated in Shanghai, China. Second, it compares the different motives, participa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vements in different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third, it examines why the boycott movement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anti-Manchu revolutionary move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Qing dynasty.

This article contends that the socio-political movements in modern China and among Overseas Chinese were closely interrelated. Nevertheless,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oycotts in China differed from those 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Furthermore, each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had its own motive and style in its anti-American campaign, based on self-interest and local socio-political constraints. This article is based extensively on local source materials

*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vailable i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Revisiting the 1905 boycott movement through the perspectives of Overseas Chinese raises new questions and issues in regar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in which Overseas Chinese were involved.

Keywords: Overseas Chinese, modern China, anti-American boycott, protest movement